

斯宾格勒与汤因比历史哲学的比较分析

高新媛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4年7月6日; 录用日期: 2024年7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4年8月8日

摘要

斯宾格勒引发了历史学界的“哥白尼式”巨变, 他将文化置于种族与国家之上, 成为理解历史的核心。在他的体系里, 世界历史被重新编排成几个同一时代、具有相等意义的文化体系。此举有效挑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历史哲学观念, 扩展了对历史探究的视角, 并为历史学的深入研究注入了新的启示, 其意义不可谓不重大。而汤因比以经验论的方式对文明的发展的阶段做出了不一样的解释, 对斯宾格勒思辨历史哲学的不足做了补充。他们在历史哲学的发展逻辑上形成了递进式的解构。

关键词

斯宾格勒, 汤因比, 历史哲学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pengler and Toynbee's Philosophy of History

Xinyuan Gao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 6th, 2024; accepted: Jul. 27th, 2024; published: Aug. 8th, 2024

Abstract

Spengler's Copernican style 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replaced nation and state with culture as the main body of history, dividing past world history into several cultures that were equivalent in meaning and contemporaneous in time.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breaking the chronic problem of European centrism in classical historical philosophy, expanding the scop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is highly inspiring for deepening historical research. However, Toynbee provided a different explanation of the stages of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through an experiential approach, supplementing Spengler's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y have formed a progressive deconstru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Keywords

Spengler, Toynbee, Philosophy of Histor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经历了古典哲学的收尾与现代哲学的转折，批评性的历史理论跻身成为历史哲学研究的主流。然而，非理性历史论和批评性历史哲学的兴起为思辨历史哲学带来了新鲜的素材。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将对历史的研究与自然分别开来，并采用直观分析代替抽象思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作为这种变革的杰出代表，将整个类发展历程作为研究的核心，不再依循古典历史理论以民族为考查的基本单位，而是以文化为研究的核心要素。这两位学者还将生物的生命周期——诞生、成长、成熟到衰亡——的自然规律引入到对文化发展的分析中，提出了各自具有特色的文明发展史论。

2. 两人文明史论之要旨

2.1. 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对历史学的探究起源于他对时政现象的浓厚兴趣，在学术探索的进程中，他对既往流行的历史观提出了怀疑，并创立了他自己的文化历史观，意图于拯救当时没落的西方文化。

斯宾格勒首先对传统的历史理论进行批判，指出其不能真正揭露历史的本质，反而误导了研究的方向。他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那个把历史分割为‘古代-中古-近代’的不可信、空洞而又毫无意义的架构，完全统治了我们的历史思想” [1]。这种架构像托勒密天文体系一样统治着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对历史知识的传播造成了偏颇，使之变得没有根据和实际意义。这种架构限制了对历史的认识，并且主导了历史的阶段性。这种历史观念其核心问题在于“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历史的发展在其中被简化为线性进程，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仅被视为西方近代史的铺垫，而西方近代则被视为所有历史的终极目标。因此，斯宾格勒像康德一样，对这种架构实施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提出了“文化形态史”的概念，用“文化”取代“人类”成为历史进程的焦点。他将生物进化学说引入自己的观点之中，认为文化是一个经历生、长、盛、衰四个过程，并且不依赖任何外在因素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的有机体。在其观点中，历史乃是诸多文明演进相汇聚的总和，而并非某种所谓的全人类的统一进程。文明的黎明起始于从基础文明跃迁至高阶文明之时，届时精神领域涌现了新的世界理念以及神话和宗教的诞生；美学层面则显现为装饰艺术及建筑风格的演变和艺术创作活动的兴盛；政治结构上展现为地主阶级统治和贵族主导的国体成型。进入文明发展的晚期，人类意识形态成熟，精神氛围转为批判性思维，这一阶段见证宗教变革与哲学思想的崛起；政治面貌则变为城邦对传统乡村的取代，以及集权国家的建立。继而进入文明终末期，这一时期精神上标志着大都市文化的曙光与原创精神的消亡，信仰神灵的情感被对科技、实用主义和追求幸福的热忱所替代；在文化方面这是一种失去深度原创性的存在，艺术品变成了奢华、享乐和刺激神经的手段，艺术风格不停变革，尽管充满了随意创新、无意义模仿和各种抄袭；政治变迁则是从财富主导逐步转变为武力统治，最终走向帝国的构建。至此，文化的潜能已耗尽，步入了没有创新能力的机械性衰退期。由此可见，文化经历了从摆脱原始束缚的觉醒，到早期通过批判

精神成熟，再经由理性的创作活动实现潜质，并因创造力枯竭而逐渐走向衰退的周期律。

斯宾格勒提出这套理论框架，旨在通过跨文化对照从而对西方社会的命运进行细致推敲与展望。得以进行此类比较与预见的根据，在于尽管不同的文明各有其独特的核心精髓，但他们仍旧遵循相似的生周期律动，借着对已往众多文明发展阶段的比较研究，能够对尚未走到尽头的现代文明做出合理的预测。

2.2. 汤因比的“历史文明”观

汤因比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理论，文明在其观点中也被视为有机体，并且文明的每一个形态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四个持续过程。他还提出“挑战”与“应战”理论来阐释世界文明的发展规律，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环境的“挑战”和人类对“挑战”作出的“应战”，而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系列“挑战”与“应战”相互角力的过程。

首先，就文明起源的问题，汤因比并不同意使用“种族优越性”或者“地缘环境”去阐述文明的形成原因。针对种族问题，众多种族皆有能创建上层社会文化，同样一个种族也能为多元文化的发展献筹策画，进一步地说，多元文明的集体合作亦可能促成某一文化的兴起。所以他认为“从文明的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察历史，把国家仅仅看作是文明的生命中次要和短暂的政治现象” [2]。由此可见，任何立足于种族的见解均难以自圆其说。就地理环境对文化进程的影响而言，相同的自然形态并不意味着必定会孕育出相同的文明轨迹，相对地，即便是地理条件一致，不同的历受时期也能孵化出各异的文化演变。由此观之，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也非完全适用。他相信，文明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人们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有成效地反击，但实际能给出这种反击的往往是寥寥可数的人，多数人只是跟随着这批先锋的脚步，模仿他们的行为，从而进入了文明时代。汤因比认为，决定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根本区别，并非体现在社会制度或者职能分工上，而关键在于所追寻的“模仿典范”。不管是处于野蛮状态还是文化社会，模仿举止均为其共通之性质。原本的社群模仿的对象乃是前辈，即那些已故的祖宗们，它受到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十分深刻，因而显得相对稳定不变。在文明社会中，模仿的对象是那些建设性思维丰富的人们，因而这样的社会持续地发展与进步，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状态。六大起源古文明，涵盖了古埃及、苏美尔、米诺斯、中国古代、玛雅及安第斯这几个历史文明体系，均直接源于原始社会进化的初代文明形态，其主要所面临的挑战局限于对抗自然界的种种考验。相较于其他的文明，大部分并非源于自然境况，而是人造环境的产物。新兴文明的形成常常与先前的旧文明有所关联，而这些旧文明通常正经历颓败与瓦解，社会结构分化为极少数统治阶级与庞大的无产阶级。统治者创新能力的丧失使其无法有效领导，只得依赖武力维持统治，导致无产者群体产生强烈的疏离感。此种疏离带有强大动力，标志着一种向好、上升的趋势。“文明的起源原来是通过内部无产者脱离现存文明社会以前的那个已经失去创造能力的少数统治者的行为而产生的。……在无产者脱离了少数统治者的运动当中，一个社会从静止状态又过渡到活动状态里，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这个情况正像从原始社会里产生了文明社会的情况一样。” [3]

在文化生成发展的轮回里，无可避免地会有退化与灭亡相伴随。在文化诞生之初，或许会经历早逝与滞缓的局面，而既成熟的文化也可能在演进的某个环节上开始缓缓走向衰亡。根据汤因比的观点，去掉两种已中断的文明，剩下的 26 种中，有 16 种正在消亡的途中，还有两种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而且有 7 种面临着可能被西方影响同化或遭到毁灭的威胁。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目前仅有西方基督教的文化还未步入衰败的阶段。文明之本源源来自于群众对富有创造性的人群之模仿，同样，文明的衰弱也与模仿行为紧密相连。仿效本质上属于一种刻板的思维习惯，有创新精神的领导人亦有可能被身边人刻板模仿的做法所左右，最终可能削弱他们的创新力，从而造成追随者的流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领导者可能会厌弃温柔的游说手法，而频繁诉诸武力或其他高压方式，逐步演变为一个倚重强制的执政者。

在这种作用之下，群众逐步停止模仿与尊敬，由顺从者转变为勉强及冷漠的“无产者”。“无产者”所指的并不是指财产上的匮乏，而是一种心灵上的反思境界，觉悟到自我虽生活于特定群体之中却并未融入其中。这将促成社会联合体的瓦解，削弱独立性，进而使文化衰落至崩溃的境地。在这场文化拆解的进程里，社会被三个层面所区分，首当其冲的就是少数具备原创能力的人转变为了统治阶层中的少数派。第二个现象是众多民众的心思涣散，导致了社会底层产生了无产阶级。高度发展社会群体的各种民族，从一开始和睦吸纳文化熏陶，逐渐演变成为持有敌对情绪的边缘化群体，变成了外国贫困阶层。正是基于这三个群体对社会裂痕的不同应对手段，引发了文明衰败过程中的一种普遍模式：在面对分崩离析所导致的动乱时，极少数的统治者试图建立起集中统一的政权体系，将一元化的国家结构强加于整个社会与平民，以此来企图重建社会秩序与一致性。贫困者为了精神层面上摆脱难以忍受的现实，纷纷加入了统一的宗教组织。而边缘化民族则常常形成武装团体，通过民族大迁移的形式冲进文明社会，掠夺濒临消亡文明的财富，并与贫困者共同瓦解了统一的国家机构。至此，该文明便告终结。然而，并非所有文明的衰败必然以灭亡告终。有些文明在其解构过程中未经历灭亡，而是在特定阶段进入了一种“静滞”状态，并在此后几千年时间里维持原状。更为关键的是，一些文明的消予殆尽，反而标志着新文化的诞生，文明的进步正是通过这种连续更替得以实现的。

3. 两人文明史论之比较

汤因比和斯宾格勒作为当时思辨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观点有着不同丰富的内涵。

汤因比对斯宾格勒采纳文化作为研究历史的根本单元表示赞赏，但是对于基于先验原则推导出的宿命论结论持反对态度，于是尝试以经验主义作为出发点重构该理论。在他们看来，构成历史研究的基础并非单独的民族或国家，而是更加广泛的概念。汤因比在说明自己的观点时指出，所谓的“文明”不是斯宾格勒所说文化的最终发展阶段，而是包含了斯宾格勒划定的文化与文明两者。斯宾格勒将不同文化视作独立不交汇的实体，汤因比则觉得，大多数文明实际上彼此之间存有各种联络，而这些联系不同于斯宾格勒所认为的生命周期内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像是代与代之间的传承。关于文明的增长周期，两位都同意文明的发展历程会经历起源、增长、衰弱、崩解乃至消亡等不同阶段，然而在如何解释这一过程时，他们分别站在了先验论和经验论相悖的立场上。在文明起源和推动力的课题上，汤因比不同意斯宾格勒的神秘化理念，而是致力于在历史事迹上寻找科学的阐释；在文明发展规律的议题上，汤因比不认可斯宾格勒基于生物学原理来为文明设定一个密闭且宿命化的时间循环表，相反，他视文明为一个自由的体系，其衰落也并非不可避免的宿命。所有这一切，在汤因比所阐述的“挑战与回应”理念里得以体现。

尽管两者均持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但相较于斯宾格勒，汤因比试图改正后者的偏狭观点和消极态度。汤因比着重指出各文明之间的联系，认可它们之间的互相作用及新文明由旧文明的根基中孕育而出，使得历史拓展至全球层面的意义。汤因比虽沿用斯宾格勒以生物学法则阐述文明兴衰的方式，但并未将其定性为不可改变的命运，而是借助“挑战-应对”模型，力求将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行科学解读。“挑战-应对”模型详细阐释了外部环境、民族特性、挑战与响应力量对比等因素在文明形成和曲折过程中的影响，揭示了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该模型目前已被社会与历史领域的研究广泛采纳。汤因比还放弃了斯宾格勒那一预定命运的、封闭的生命阶段理论，以挑战与应对之间的实际交互为依据，为不同文明设计了包括“夭折”、“停滞”、“衰败”等多种不同的走向。尽管在他的分析中，28种文明中有的未能发展成型，有的停止发展，有的走向灭亡，有的挣扎求生，有的正面对同化或消亡的威胁，但汤因比仍然给予了西方文明继续发展的余地。虽说西方文明只是众多案例之一，但这足以表明汤因比并不认为衰败是所有文明不可避免的归宿。

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方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震荡与激变，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把各国推向了自我反思的新阶段。斯宾格勒、汤因比、考察了西方社会的现状与未来，把人类历史研究指向文化，从发展的角度来探究人类文明，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 历史主体就是文明。他们共同指出文明才是历史的真正载体，历史的意义存在于文明之中。2) 文明的多元性。他们打破了“欧洲中心论”，认为人类文明是平等多样的，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历史特征。3) 对文明前景的担忧和展望。他们以思想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为人类文明未来走向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4. 结语

传统史学的哲理探讨，挑选了哲学逻辑推演覆盖对经验事实的剖析，这在历史研究范畴内酿成了深远的不良影响。现行的历史哲学思维，更倾向于将历时性的文明进退作为研究核心，摒弃对民族或国家史的单一关注，构建了具备理论价值的历史分析架构。尽管如此，经典的哲学推理致力于用先验性质的框架置换掉基于经验的研究方法，在斯宾格勒的著作中异常显著。斯宾格勒一方面吸纳了现代历史批判性哲学的某些理念，凸显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要关注独一无二、非重复性的个案，同时否定历史过程的规律性。而另一方面，又试图透过自身构建的历史诠释框架，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普适性，导致方法上的自我矛盾尴尬。这一现象表明，历史研究本体和对历史观念的批判性思考缺一不可，是支撑历史哲学成长的重要因素，唯有将二者有效融合，方能为历史哲学的进步提供坚固的理论支撑。

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自治区重点文科基地学生创新基金项目招标课题“新时代提升我国宗教事务治理能力研究”(项目编号: ZFZJX202307)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 [1] [德]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M]. 陈晓林, 译. 哈尔滨: 黑龙江出版社, 1988: 13.
- [2] [英]汤因比. 文明经受着考验[M]. 沈辉,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191.
- [3] [英]汤因比. 历史研究上卷[M]. 曹未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62.